

百年
中国文学
总系

主编 / 谢冕
孟繁华

1928

革命文学

旷新年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百年
中国文学
总系

主编 / 谢冕
孟繁华

1928

革命文学

旷新年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1928:革命文学/旷新年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
(“重写文学史”经典·百年中国文学总系/谢冕,孟繁华主编)
ISBN 978-7-02-010846-6

I. ①I… II. ①旷… III. ①中国文学—现代文学史—1928 IV. ①
I209.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60282号

责任编辑 付如初
装帧设计 柳 泉
责任印制 王景林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北京明恒达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245千字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 张 11.875 插页2
版 次 2017年3月北京第1版
印 次 2017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0846-6
定 价 34.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新版序言

怀念那个学术年代

孟繁华

《百年中国文学总系》在谢冕先生的领导下,历经七年时间,于1998年5月由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书系出版后,在学界产生了极大的反响。两年间海内外有近百篇评论文章发表。关于书系的要义、构想及写作过程,谢冕先生在总序一《辉煌而悲壮的历程》和我在总序二《〈百年中国文学总系〉的缘起与实现》中,已做了详尽说明,这里不再赘述。我想说的是,当近二十年过去之后,我对那个学术年代充满了流连和怀念。

1989年秋季,谢冕先生在北大创办的“批评家周末”,一直坚持到1998年。十年间,谢先生带领我们讨论与当代文学有关的各种问题。除了谢先生带的博士研究生和国内外访问学者外,许多在京的青年学者和批评家都参加了这一学术沙龙性质的活动。1999年,我在《批评家周末十年》一文中记述了当时的情景——

1989年10月,谢冕先生在北京大学创办了“批评家周末”,他用这一形式对就学于他的博士生和国内外访问学者进行教学和研讨活动。基于当时空旷寂寞的学术环境和

“批评家周末”的影响,一些青年教师和在京的青年批评家,也都纷纷加入了这一定期活动,这不仅极大地提高了研讨的学术质量,同时也在有限的范畴内活跃了当时的学术气氛,并形成了当代文学研究规模可观的学术群体,使学院批评在社会一隅得以存在和延续。逝者如斯,蓦然回首,“批评家周末”已经经历了十个年头。当它仍在继续并取得了丰硕成果的时候,回望十年,它特别值得我们纪念。

这一批评形式的创造性,不在于它的命名,重要的是它改变了传统的教学方式,改变了课堂教学单向度的知识传授。自由讨论和畅所欲言,不仅缓释了那一时代青年参与者的抑郁心情和苍茫感,同时,它宽松、民主、平等的环境,更给参与者以无形的熏陶和浸润,并幻化为一种情怀和品格,而这一点可能比它取得的已有成果更为重要。或者说:“批评家周末”首先培育了学者应有的精神和气象,它以潜隐的形式塑造了它的参与者。

十年来,在谢冕先生的主持下,它的成员先后完成了多项重要的学术工程,“20世纪中国文学”丛书十卷、《中国百年文学经典》十卷、“百年中国文学总系”十二卷,在学界和社会上产生了强烈反响,给学科建设以极大的推动和影响。这些成果,不仅对百年来中国文学实施了一次重新书写,同时也以新的观念改变了传统的研究方式,为学科建设注入了新质。而这些研究同样体现了批评家周末的精神,它虽然也是群体性的写作,但它同传统的文学史编写有极大的不同。谢冕先生提出了总体构想之后,并不强调整齐划一,并不把他的想法强加给每个人,而是充分尊重作者的

独立性,充分发挥每个人的学术专长,让他们在总体构想的范畴内自由而充分地体现学术个性。因此,这些学术作品并不是线性地建构了“文学史”,并不是为了给百年文学一个整体“说法”,而是以散点透视的形式试图解决其间的具体问题,以“特写镜头”的方式深入研究了文学史制度视野不及或有意忽略的一些问题。但“百年文学”作为一个新的概念和总体构想,显然又是这些具体问题的整体背景。这一构想的实现,为百年中国文学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参照和生长点。

那时,包括洪子诚先生在内的书系的作者,都是这个学术群体的成员,几乎没有间断地参加了“批评家周末”的所有活动。这个学术共同体已经成为历史,但是它形成的学术传统却深刻地影响了所有的成员。后来我一直在想:“批评家周末”完成的所有项目,都没有“立项”,既不是“国家社科基金”,也不是“重点”或“重大”;既没有经费也没有赞助。但是,书系的所有作者心无旁骛,一心问学。认真地报告、认真地倾听,然后是激烈的争论。谢先生有他整体性的构想,但他更强调作者个人的主体性,并且希望尽可能保有作者个人的想法甚至风格。现在看来,书系在写作风格和具体结构方面并不完全一致,比如,谢先生的《1898:百年忧患》,从“昆明湖的石舫”写起,那艘永远无法启动的石舫意味深长;钱理群先生的《1948:天地玄黄》,广泛涉及了日记、演出、校园文化等;李书磊的《1942:走向民间》从“两座城”和“两个人”入手;洪子诚的《1956:百花时代》,则直接入题正面强攻。如此等等,既贯彻了主编的整体意图,又充分彰显了作者的个人长处。自由的学术风气和独立的思想,就这样弥漫

在这个群体每个人的心灵深处。于是我想,学术理想、学术气氛和学术信念,可能远比那些与学术无关的事务更有感召力和感染力。这种力量就源于学人内心的纯净或淡然,与功利无关。我这样说,并不意味着这套书系有多么了不起、如何“经典”。需要强调的是,它经受了近二十年的检验,它还需要经历更长时间的检验。如今,书系的作者之一程文超教授已经去世多年,很多先生也已退休,但是,我们曾经共同拥有的过去,将是值得我们永远怀念和珍惜的人生风景。

现在,这套《百年中国文学总系》由国家专业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重新出版,我们内心的感奋可想而知。人民文学出版社不讲任何条件的胸怀和气象,让我们深受鼓舞。在一个商业气息弥漫四方的时代,让我们感到还有不灭的文化情怀一息尚存。这里,我要特别感谢责任编辑付如初博士。因为她对这套书价值的认识,因为她的提议获得了社领导的有力支持,于是便有了今天《百年中国文学总系》重新出版的机会。当然,他们一定承受了巨大的压力。

书系新版序言本来应该由谢冕先生来写,不仅名正言顺,而且会要言不烦。但谢先生指示由我代笔,师命难违,只好勉为其难。敬请方家指正。

是为序。

2015年3月8日于香港岭南大学

总序一

辉煌而悲壮的历程

谢冕

百年中国文学这样一个题目给了我们宏阔的视野。它引导我们站在 20 世纪的苍茫暮色之中,回望 19 世纪末中国天空浓重的烟云,反思中国社会百年来的危机与动荡给予文学深刻的影响。它使我们经受着百年辉煌的震撼,以及它的整个苦难历程的悲壮。中国百年文学是中国百年社会最亲密的儿子,文学就诞生在社会的深重苦难之中。

近、现代的中国大地被它人民的血泪所浸泡。这血泪铸成的第一个精神产品便是文学。最近去世的艾青用他简练的诗句传达了作家对于他亲爱的土地的这种感受:

假如我是一只鸟

我也应该用嘶哑的喉咙歌唱

这被暴风雨所打击着的土地

这永远汹涌着我们悲愤的河流

这无止息地吹刮着的激怒的风……

和那林间无比温柔的黎明……

——然后我死了

连羽毛也腐烂在土地里面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

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嘶哑的喉咙的歌唱、感受到的悲愤的河流和激怒的风，以及在温柔的黎明中的死去，这诗中充盈着泪水和死亡。这些悲哀的歌唱，正是百年中国文学最突出、最鲜明的形象。

我在北京写下这些文字的时间，是公元1996年的5月。由此上溯100年，正是公元1896年的5月。这一年5月，出生在台湾苗栗县的诗人丘逢甲写了一首非常沉痛的诗，题目也是悲哀的，叫《春愁》：“春愁难遣强看山，往事惊心泪欲潸。四百万人同一哭，去年今日割台湾。”诗中所说的“去年今日”，即指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甲午战败的次年。此年签订了《马关条约》，正是同胞离散、民族悲痛的春天的往事。

中国的近、现代就充斥着这样的悲哀，文学就不断地描写和传达这样的悲哀。这就是中国百年来文学发展的大背景。所以，我愿据此推断，忧患是它永久的主题，悲凉是它基本的情调。

它不仅是文学的来源，更重要的是，它成了文学创作的原动力。由此出发的文学自然地形成了一种坚定的观念和价值观。近代以来接连不断的内忧外患，使中国有良知的诗人、作家都愿以此为自己创作的基点。不论是救亡还是启蒙，文学在中国作家的心目中从来都是“有用”，文学有它沉重的负载。原本要让人轻松和休息的文学，因为这责无旁贷和义无反顾的超常的负担而变得沉重起来。

中国百年文学,或者说,中国百年文学的主流,便是这种既拒绝游戏又放逐抒情的文学。我在这里要说明的是中国有了这样的文学,中国的怒吼的声音、哀痛的心情,于是得到了尽情的表达,这是中国百年的大幸。这是一种沉重和严肃的文学,鲁迅对自己的创作作过类似的评价。他说他的《药》“分明留着安特莱夫式的阴冷”;说他的《狂人日记》,“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却比果戈理的忧愤深广”,“也不如尼采超人的渺茫”;有人说他的小说“近于左拉”,鲁迅分辩说:“那是不确的,我的作品比较严肃,不及他的快活。”

从梁启超讲“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起,到鲁迅讲他“为什么要写小说”旨在“启蒙”和“改良这人生”止,中国文学就这样自觉地拒绝了休息和愉悦。沉重的文学在沉重的现实中喘息。久而久之,中国正统的文学观念就因之失去了它的宽泛性,而渐趋于单调和专执。文学的直接功利目的,使作家不断把他关心的目标和兴趣集中于一处。这种“集中于一处”,导致最终把文学的价值作主流和非主流、正确和非正确、健康或消极等非此即彼的区分。被认为正确的一端往往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嘉许和支持,自然地生发出严重的排他性。中国文学就这样在文学与非文学、纯文学与泛文学、文学的教化作用与更广泛的审美愉悦之间处境尴尬,更由此引发了无穷无尽的纷争。中国文学一开始就在酿造着一坛苦酒。于是,上述我们称之为中国文学的大幸,就逐渐地演化为中国文学的大不幸。

中国近代以来危亡时势造出的中国文学,百年来一直是作为疗救社会的“药”而被不断地寻觅着和探索着。梁启超的文

学思想是和他的政治理想紧紧相连的,他从群治的切入点进入文学的价值判断,是充分估计到了小说在强国新民方面的作用的。文学楔入人生、社会,希望成为药饵,在从改造社会到改造国民性中起到直接的作用。这样,原本“无用”的文学,一下子变得似乎可以立竿见影地“有用”起来。这种观念的形成,使文学作品成为社会人生的一面镜子,传达着中国实际生活的欢乐与悲哀。文学不再是可有可无之物,也不再是小摆设或仅仅是茶余饭后的消遣,而是一种刀剑、一种血泪、一种与民众生死攸关的非常具体的事物。

文学在这样做的时候,是注意到了它的形象性、可感性,即文学的特殊性的。但在一般人看来,这种特殊性只是一种到达的手段,而不是自身。文学的目的在别处。这种观念到后来演绎为“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就起了重大的变化。而对于文学内容的教化作用不断强调的结果,在革命情绪高涨的年代往往就从强调“第一”转化为“唯一”。“政治唯一”的文学主张在中国是的确存在过的,这就产生了我们认知的积极性的反面——即消极的一面。不断强调文学为现实的政治或中心运动服务的结果,是以忽视或抛弃它的审美为代价的:文学变成了急功近利而且相当轻视它的艺术表现的随意行为。

百年中国文学的背景是一片苍茫的灰色,在灰色云层空茫处,残留着19世纪末惨烈的晚照。那是1840年虎门焚烟的余烬,那是1860年火烧圆明园的残焰,那是1894年黄海海战北洋舰队沉船前最后一道光痕……诞生在这样大背景下的文学,旨在扑灭这种光的漫延,的确是一种大痛苦和大悲壮。但当这一切走向极端,这一切若是以牺牲文学本身的特性为代价,那就会

酿成文学的悲剧。中国近、现代历史并不缺乏这样悲剧的例子，这些悲剧的演出虽然形式多端，但亦有共同的轨迹可寻，大体而言，表现在下述三个方面：

一、尊群体而斥个性；

二、重功利而轻审美；

三、扬理念而抑性情。

8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实行开放政策，经济的开放影响到观念的开放，极大地激活了文学创作。历史悲剧造成的文学割裂的局面于是结束，两岸三边开始了互动式的殊途同归的整合。应该说，除去意识形态的差异不谈，中国文学因历史造成的陌生、距离和误解正在缩小。差别性减小了，共同性增多了，使中国原先站在不同境遇的文学，如今站在了同一个环境中来。商业社会的冲击，视听艺术的冲击，这些冲击在中国的各个地方都是相同的。市场经济和商品化社会使原来被压抑的欲望表面化了。文学艺术的社会价值重新受到怀疑。文学创作的神圣感甚至被亵渎，人们以几乎不加节制的态度，把文学当作游戏和娱乐。

摆脱了沉重负荷的文学，一下子变得轻飘飘的，它的狂欢纵情的姿态，表现了一种对于记忆的遗忘。19世纪末的焦虑没有了，19世纪末那种对于文学的期待，也淡远了。在缺乏普遍的人文关怀的时节，倡导重建人文精神；在信仰贫乏的年代，呼吁并召唤理想的回归；这些努力几乎无例外地受到嘲弄和抵制。这使人不能不对当前的文化趋势产生新的疑虑。

在百年即将过去的时候，我们猛然回望：一方面，为文学摆脱太过具体的世情的羁绊重获自身而庆幸；一方面，为文学的对

历史的遗忘和对现实的不再承诺而感到严重的缺失。我们曾经自觉地让文学压上重负,我们也曾因这种重负而蒙受苦厄。今天,我们理所当然地为文学的重获自由而感到欣悦。但这种无所承受的失重的文学,又使我们感到了某种匮乏。这就是这个世纪末我们深切感知的新的两难处境。

我们说不清楚,我们只是听到了来自内心的不宁。我们有新的失落,我们于失落之中似乎感到了冥冥之中的新的召唤。在这个世纪的苍茫暮色中,在这个庄严肃穆的时刻,难道我们是企冀着文学再度听从权力或金钱对它的驱使而漂流吗?显然不是。我们只是希望文学不可耽于眼前的欢愉而忘却百年的忧患,只是希望文学在它浩渺的空间飞行时不要忘却脚下深厚而沉重的黄土层——那是我们永远的家园。

总序二

《百年中国文学总系》的缘起与实现

孟繁华

《百年中国文学总系》的出版,于它的参与者们来说,无疑是一件令人感奋的事情,它使每位著者多年从事的、有兴趣的研究对象,在一个整体性的框架内得以表达,在充分体现作者学术个性的前提下,又集中表达了一个学术群体对百年中国文学的思考。在又一个世纪即将莅临之前,我们将自己的思考留在这个世纪的黄昏。

这是一个学术群体共同完成的成果。应该说,每位著者都在自己述及的时段长期从事教学和研究,并有影响不同的成果在学界产生反响。需要指出的是,“百年中国文学”这一概念,首次诞生于80年代末期,它的提出者,是丛书主编谢冕先生。那是中国社会生活发生了重大变动的年代,它不只是经济活动合理地成为社会生活的主体,而且,长期占支配地位的社会价值观念、思想观念和道德观念等,都发生了重大变动甚至解体。百年中国的命运及当下的现实,使许多知识分子的内心凝重而悲凉。与历史的断裂感,洪水出闸般地掠过人们心的堤坝,对自身生活丧失解释力的苍茫感,被许多人隐约感到。一时间,“失

语”一词开始流行。所谓“失语”，并非是学人丧失了学术表达的语言能力，关键是对个体的生存方式和价值产生了怀疑，他们的社会位置发生了突变。谢冕对这些变化并非没有感知，但他从未表达，在他的学生面前依然如故。出于对学术发展和教学的考虑，自1989年10月起，他以“批评家周末”的形式，对就学于他的博士生和国内外访问学者进行教学和研讨活动，决定对百年中国文学进行系统的梳理和研究。限于当时的学术环境和“批评家周末”的影响，在京的许多青年学者和在校的青年教师，都自愿地参加了这一定期的活动。这不仅提高了研讨活动的学术质量，同时也为青年学人提供了较好的学术环境。“百年中国文学”的概念，正是这时由谢冕先生正式提出的。他指出：“百年中国文学”的提出，受到了黄子平、钱理群、陈平原三人于80年代中期提出的“20世纪中国文学”的启发，这一文学整体观的思路有很大的开创性，在当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现、当代中国文学研究的传统思路。但是，由于各种原因，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研究实践，尚未来得及展开。我们的工作，则是进行具体的操作实践。不同的是，谢冕的“百年中国文学”的思路，将视野前移至1895年前后。在他看来，发生于1898年的戊戌变法，开启了中国知识分子思考中国变革的先声，它极大地启发了后来者，或者说，那一事件作为重要的思想资源，不断地鼓舞、感召了富有忧患传统的中国知识界。因此，他的“百年中国”，大体指的是1895至1995年。

1989年10月至1990年7月，谢冕主持了他总体构想中的第一阶段的工作，他将研究活动的总题目命名为“百年中国文学——世纪之交的凝望”，在这一总题目下，有十个具体的研究

题目在那一年完成,并先后在国内重要的学术刊物上发表,成书后因出版原因而束之高阁。但它为后来的工作奠定了基础并积累了经验。1990年开始,总体构想中的“20世纪中国文学”丛书付诸实施,丛书十卷于1993年由时代文艺出版社一次出齐,它受到了国内外学界的关注和好评。谢冕在丛书的总序中,简约地回顾了中国文学与百年中国的关系,检讨了百年来文学与现实难以分离的合理性及其后果。他说:“中国文学的创作和研究受制于百年的危亡时世太重也太深,为此文学需自愿地(某些时期也曾被迫地)放弃自身而为文学之外的全体奔突呼号。近代以来的文学改革几乎无一不受到这种意识的约定。人们在现实中看不到希望时,宁肯相信文学制造的幻象;人们发现教育、实业或国防未能救国时,宁肯相信文学能够救民于水火。文学家的激情使全社会都相信了这种神话。而事实却未必如此。文学对社会的贡献是缓进的、久远的,它的影响是潜默的浸润。它通过愉悦的感化最后作用于世道人心。它对于社会是营养品、润滑剂,而很难是药到病除的全灵膏丹。”文学的功用曾被人为地夸大,但考虑到百年中国具体的历史处境,他同时指出:

一百年来文学为社会进步而前仆后继的情景极为动人。即使是在文学的废墟之上我们依然能够辨认出那丰盈的激情。我们希望通过冷静的反思去掉那种即食即愈的肤浅而保留那份世纪的忧患和欢愉。文学若不能寄托一些前进的理想给社会人心以导引,文学最终剩下的只能是消遣和涂抹。即真的意味着沉沦。文学救亡的幻梦破灭之后,我们坚持的最后信念是文学必须和力求有用。正是因此,

我们方在这世纪黄昏的寂寞一角辛苦而又默默地播种和耕耘。

这样的认识或许不合时宜,或许因不够“新潮”而有保守和“传统”之嫌,但它显示出的作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郑重思考,却依然令人为之动容。最后他说:

作为20世纪的送行人,我们感到有必要把这一代人的醒悟予以表达。这种表达当然只能通过文学的方式。我们期待着放置于百年忧患背景之上而又将文学剥离其他羁绊的属于文学自身的思考。这种思考不意味着绝对的纯粹性,它期待着文学与它生发和发展的背景材料紧密联系。我们希望这种思考是全景式的,通过对于文学追求的描写折射出这个世纪的全部丰富性。

这套丛书,最大限度地发挥了每个作者的创造性,这些作品的学术个性及影响,至今仍为人们热情地谈论。但它不是在整体性的学术框架内系统谈论百年文学的著作。与此同时,1993年,谢冕主编了一本名为《中国文学百年梦想》的书,试图从文化思想史的角度,描述出百年中国文学的思想文化背景。这些,都是谢冕对百年中国文学总体研究构想的一部分。它们都还没有接近最后的目标。

1992年7月始,他逐渐向这一目标靠近。在那段时间里,“批评家周末”的成员,也是丛书的大部分作者,开始就自己承担的工作在研讨会上报告。“百年中国文学”的大部分内容,都曾在研讨会上报告过。“批评家周末”的成员们,对每一个报告都热情地提出了建议和看法,它对于丰富丛书的内容、拓展作者